

宋代杜诗辑注源流述略

许 总

中晚唐时期，在杜诗得到充分估价的同时，“采其遗文”，类编成集的工作亦已开始^①。然而，对杜诗的大力搜集、整理、编年、分类、笺注、评点，蔚为一代之风，形成专门之学，则是在宋代才兴盛起来。所谓“千家注杜”，可见当时盛况。

宋人编辑杜诗，始自孙仅，其所作《读杜工部诗集序》，多为各家杜集转录。然王洙《杜工部集记》注中标为“孙仅一卷”，可见其所辑杜诗规模甚微。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著名诗人苏舜钦整理旧集，增入新本，编成《老杜别集》，其《题杜子美别集后》云：

杜甫本传云，有集六十卷。今所存者才二十卷，又未经学者编辑，古律错乱，前后不伦。盖不为近世所尚，坠逸过半。吁，可痛悯也。天圣末，昌黎韩综官华下，于民间传得号《杜工部别集》者，凡五百篇，予参以旧集，削其同者，余三百篇。景祐初侨居长安，于王纬主簿处又获一集，三本相从，复择得八十余首。皆豪迈哀顿，非昔之攻诗者所能依倚，以知亦出于斯人之胸中。

可见苏氏整理杜诗，用力甚勤，并从韩综本增补三百余篇，从王纬本择得八十余首，合之旧集，成为初经爬抉的新本。三年之后，宝元二年（1039），王洙又编了一部《杜工部集》。王氏学

识渊博，《宋史》本传称其“泛览传记，至图纬、方技、阴阳、五行、算数、音律、詁训、篆隶之学，无所不通”。王氏治杜，正是以渊通之学，勤勉之力，沉潜于对杜诗的编辑整理，“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，除其重复，定取千四百有五篇，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，近体千有六，起太平时，终湖南所作，视居行之次，与岁时为先后，分十八卷，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，合二十卷”^②，其所编杜集，不仅参考了大量有关旧本，收诗总数与今存杜集较为接近，而且区分古近体，以“岁时为先后”，进行了初步的分类和编年。同时人刘敞还编有《杜子美外集》。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王安石又编成《杜工部诗后集》，其序云：

予之令鄞，客有授予古之诗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观之，予知非人所能为，而为之实甫者，其文与意之著也。

将《洗兵马》以下“世所不传者二百余篇”补入杜集。

当时杜集既有各种古本，又有诸家所编别集、外集、后集之类，不仅杂乱，且为手抄流传。为了改善这种状况，嘉祐四年（1059），王琪与友人何璩、丁修，在王洙本的基础上，并参照“今古诸集”，重新编订，又经裴煜复视补遗，“乃益精密，遂镂于版，庶广其传”^③，便成为此后所有杜集的祖本。张元济《宋本杜工部集跋》记云：

自后补遗、增校、注释、批点、集注、分类、编韵之作，无不出于二王之所辑梓。

可见杜集首次刊行，广为流传，实为二王之功。后来据以翻刻者甚多，而二王原刻本却遗佚未传，至为憾事。据此本翻刻的，主要有绍兴年间的王祖宁本和吴若本，清初钱谦益笺杜，就是以吴若本为底本，并称之为“最为近古，他本不及”。南宋期间，士大夫虽然展转于兵火戎马之间，但由于时代和环境更与杜甫遭遇相似，对于杜诗，“平时读之，未见其工，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，诵其诗如出乎其时，犁然有当于人心，然后知为古今绝唱

也”^④，所以对于杜集的整理刊行，反而更为兴盛。仅绍兴年间就有好几种杜集版本出现，除上述王祖宁本和吴若本两种外，还有郑印本、鲁嵩本和黄长睿本。黄长睿编《校定杜工部集》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：

秘书郎黄伯思长睿所校，既正其差误，参岁考月，出处异同，古律相间，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，杂著二十九首，别为二卷。

此本首次打破王洙以来古、近体分编的体例，“参岁考月”，以编年为主，同时对杜诗又进行了一次搜集，数目更接近于今天的传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“读杜愚得”条云：

考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称尝撰杜诗编年集，则编年实始自伯思，其本今已不传。

可见杜诗编年实始自黄长睿本，只是此书未能传世。

随着杜诗的编校益精、流传益广，杜诗注本亦纷然而起。仅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的已不为少，如王洙《注杜诗》三十六卷，薛苍舒《杜诗刊误》一卷，《杜诗补遗》五卷，《续注杜诗补遗》八卷，杜田《杜诗补遗正谬》十二卷，洪兴祖《杜诗辨证》二卷等。四部丛刊本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·集注杜工部诗姓氏》所录宋人注杜更多，如苏轼《老杜事实》，王彦辅《增注杜工部诗》四十九卷，鲍彪《杜诗谱论》，赵次公《杜诗正误》，师古《杜诗详说》二十八卷，鲁嵩《注子美诗》十八卷，薛梦符《杜诗广注》，杜修可《杜诗续注》等。一时之盛，实为空前。虽然有人认为其中有些杜诗注者不尽可信，如元好问曾力辨“原叔未尝注杜诗”^⑤，并据吴激说，断王洙所注为邓忠臣“平生究竭心力而为之者”，对此，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九引《洪驹父诗话》云“世所行注老杜诗，云是王原叔，或云邓慎思，所注甚多疏略，非王邓书也”，并指出一些殊为可笑的例子，认为既非王洙，亦非邓忠臣；又如洪迈《容斋随笔》云“蜀本刻杜

集，以《老杜事实》为东坡所作，遂以入注，殊误后生”。朱熹《跋集注杜诗》亦云“其所引《东坡事实》者，非苏公作……所引皆无根据，反用杜诗见句增减为文，而傅其前人名字，托为其语，至有时世先后，颠倒失次者。旧尝考之，知其决非苏公书也”。但是，尽管这些注本可能不是王洙、苏轼所作，却无疑是出于宋人之手，仍可窥见当时注杜盛况之一斑。亦正因为注杜之盛，各种注本广为流传，杜诗集注本于是应运而生。淳熙八年(1181)，蜀人郭知达辑得王文公、宋景文、豫章先生、王原叔、薛梦符、杜时可、鲍文虎、师民瞻、赵彦材等九家注本，“精其讎校，正其讹舛，大书锓版”^⑥，成《杜工部诗集注》（一称《九家集注杜诗》）三十六卷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：

蜀人郭知达所集九家注。世有称东坡《杜诗故事》者，随事造文，一一牵合，而皆不言其所自出，且其辞气，首末若出一口，盖妄人依托以欺乱流俗者。书坊辄入集注中，殊败人意。此本独削去之。

可见郭知达集注本不仅收罗较广，且芟芜取精，颇为精审，是集注本中之珍品。

宋人编辑、注释杜诗，已有分类、编年之两途，分道扬镳，各师其源，极为显明。分类本又有按诗体分为古、近体以及按题材分为“纪行述怀门”、“居室邻里，题人居室田圃门”、“皇族世胄宗族外族婚姻门”、“仙道隐逸释老寺观门”等两种。较早的分类本有徐居仁《门类杜诗》、陈浩然《杜工部诗》。据陈本改编的有《门类增广十注杜工部诗》，据徐本编刻的有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。后来的《集千家注分类杜工部诗》，亦以徐本《门类杜诗》为底本，荟萃了各家注释，最后加上黄希、黄鹤父子补注而成。对黄氏父子注杜，杨万里记云：“梦得（黄希字梦得）之学，奄有古今，晚年作诗慕少陵句法，有补注杜诗，搜剔隐微，皆前人所未发，未成而卒，子鹤续成之，名曰《黄氏补注杜

诗》。”除以徐居仁门类本为基础而至于千家注，最后到黄鹤补注为高峰的分类系统，还有以鲁訾编年本为底本直到蔡梦弼《草堂诗笺》为最后总结的编年系统。其实，杜诗编年，在鲁訾之前，已有黄长睿本，可惜此本未能流传，南宋注家即未得见；还有蔡兴宗本，但其误舛甚多，因不为人所重。鲁訾编次杜诗十八卷，原本今已不传，其序作于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，略云：

余因旧集，略加编次，以古诗近体，一其后先，摘诸家之善，有考于当时事实及地理岁月与古语之的然者，聊注其下。

首先利用此本注释的是王十朋的《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》三十二卷。稍后，嘉泰四年（1204），建安蔡梦弼又就鲁氏编次加以会笺，编成《杜工部草堂诗笺》五十卷，附外集一卷。蔡氏跋云：

因博求唐宋诸本杜诗十门聚而阅之，重复参校，仍用嘉兴鲁氏编次先生岁月之先后，以为定本。每于逐句本文之下，先正其字之异同，次审其音之反切，方作诗之义以释之，复引经子史传记以证其用事之所出，离为若干卷，曰《草堂诗笺》。

可见，蔡氏的《草堂诗笺》，是企图综合各种杜集而成为较为完善的会笺本。这种汇众家之长的的工作，在当时杜集各种版本的刻印和流传非常复杂的情况下，显然是及时而必要的。因而，其原刻虽已散落，但其影响较大，流传广泛，宋末坊间据以重刻的胖合本，却流传至今，使人尚能略窥其本来面目。

宋人为杜诗编年，实属知人论世的思想所指导，鲁訾《编次杜工部诗序》云：

骚人雅士，同知祖尚少陵，同欲模楷声韵，同苦其意律深严难读也。余谓：……离而序之，次其先后，时危平，俗媿恶，山川夷险，风物明晦，公之所寓，舒局皆有概见，如

陪公杖履而游四方，数百年间，犹有面语，何患于难读耶！鲁氏认为，只要顺循杜甫的人生道路研读杜诗，即可清晰地了解其深刻的内涵意义，实为不刊之论。为了做到进一步的知人论世，宋人还专门为杜甫编造年谱，开创了杜甫研究的新领域，明清时期直至近代学者编撰杜甫年谱以至杜甫评传，对杜甫的行踪及思想进行专门研究，亦导源于此。宋人编杜甫年谱，鲁耆之外，最早的有吕大防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记云：

吕微仲（吕大防字微仲）在成都时尝谱其年月。

吕大防《杜少陵年谱后记》云：

予苦韩文、杜诗之多误，既讎正之，又各为年谱，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，而略见其为文之时，则其歌时伤世、幽忧切叹之意，粲然可观。又得以考其辞力，少而锐，壮而肆，老而严，非妙于文章，不足以至此。

在吕氏看来，为作家编造年谱，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其人生道路，而且亦可探得其艺术创作的发展规律。吕氏所作，虽然较为简单，但却是杜甫年谱中的首创之举，实当珍视。其后，宋代编注杜诗者亦多编有年谱，除未传世者，仅今日可见的就有吕大防、蔡兴宗、鲁耆、赵子栎、黄鹤等诸家。递相祖述，益见精细，并成为杜诗辑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宋人研究杜诗，除整理、编辑、笺注外，还有大量的评论，太多散见各家文集。南宋末年，更有系统的杜诗评点本出现，高楚芳编辑的《集千家注批点杜工部诗》，即为刘须溪所评点。元大德七年（1303），刘将孙为此书作序，略云：

先君子须溪先生每浩叹学诗者各自为宗，无能读杜诗者。平生屡看杜集，既选为兴观，他评注尚多，批点皆各有意。高楚芳美萃刻之，复删旧注之无稽者，汎滥者，特存精确必不可无者，求为序以传。是本净其繁芜，可以便读者得其神，而批评标撮，足使疑悟，固草堂集之郭象本矣。

可见，评点的作用，正是明其隐奥，发其精华，使读者“得神”、“灵悟”。这一评点本，在元明间，翻刻竟出，极为流行，亦可证其价值之所在。唐五代以迄两宋，杜诗研究者益见增多，学人说杜蔚成风气，杜诗评论卷帙充盈，因此，对诸多评论的整理汇集，并对其加以适当的评介，在宋代已成为势所必需。蔡梦弼所撰《草堂诗话》，方深道所撰《诸家老杜诗评》，就是将唐宋以来诸家论杜语加以归纳汇辑，并参以己见，而成为杜诗研究的专门著作。方深道《诸家老杜诗评序》云：

先兄史君尝类集老杜诗史，仍取唐宋已来名士评公诗者，悉摭其语，别为卷帙，号曰《老杜诗评》，以附诗史之后，俾览者有所考证。深道须次之暇，又于后来诸小说中，择其未经纂录者，自《洪驹父诗话》以下，凡八家，从而益之。

可见其搜集之勤。蔡梦弼《草堂诗话》在将诸家所论类辑的同时，已略加别白，如卷二有云：

子美《戏作俳谐体遣闷》云：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。”……沈存中《笔谈》以乌鬼为乌猪，谓其俗呼猪作乌鬼之声也；《蔡宽夫诗话》以乌鬼为巴俗所事神名也；《冷斋夜话》谓巴蜀多事乌蛮鬼，以临江，故顿顿食黄鱼耳；《湘素杂记》以鸬鹚为乌鬼，谓养之以捕鱼也。然《诗辞事略》又谓：楚峡之间事乌为神，所谓神鸦也……。梦弼谓：当以此《事略》之言为是也，盖养乌鬼，食黄鱼，自是两义，皆记巴中之风俗也。峡中黄鱼极大者至数百斤，小者亦数十斤……是鱼豈鸬鹚之所能捕哉？彼以乌鬼为鸬鹚，其谬尤甚矣。

辨伪存真，多有卓见。略举其例，以见一斑。方、蔡之著，开创了杜诗研究之新径，实为历代杜诗学研究专著之滥觞。金人元好问即博综唐宋以还的杜诗评论成一专著，名曰《杜诗学》，更明

确提出“杜诗学”的概念，无疑是取法乎方、蔡而又加以发展的。但颇为遗憾的是，学术界在杜诗研究以及对历代杜集的整理、评介的工作中，却忽略了宋人这一方面的开创之功，未能对宋代杜诗学专著的价值给以足够的评价。本文略及于此，意欲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，更希望开展深入研讨。

由上所述，可见宋代对杜诗的辑注已具相当规模，发展到清代至于极盛的“杜诗辑注学”，实际上在宋代已经兴起。

一九八二年暮冬初稿 一九八五年孟夏改定

注：

①参阅拙文《唐人论杜述评》，载《唐代文学论丛》第五辑。

②王洙《杜工部集记》。

③王琪《杜工部集后记》。

④李纲《重校正杜子美集序》。

⑤元好问《中州集》卷二祝太常简条。

⑥郭知达《杜工部诗集注序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

